

The Basis,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of Virtue Rule in the Culture of Yuandian

Xiaoming Zhang Wenxue Zhang

Marxist College of Hubei University of Automotive Technology, Shiyan, Hubei, 442000, China

Abstract

“Yuandian” is a classic book established by a nation after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civilization and undergoing a period of development, which has typ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For example, the Vedic scriptures and Buddhist scriptures in India, the *Quran* in Islam, and *The Bible* in Hebrew and Christianity can all be said to be scripture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the “Six Classics” such as the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Book of Songs*, *The Book of History*, *The Book of Rites*, *The Book of Music*, and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the “Yuandian”, are the first to be promoted. I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inner transcendent spirit contained in the Yuandian is constantly “reconstructed” and concretized. Using these ideas to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history, which has been constantly polished and preserved. It can withstand the test of time, the erosion of history, and is a major step forward for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people-oriented ideology;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元典文化中的德治主义之根据、逻辑与转换

张晓明 张文学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湖北·十堰 442000

摘要

“元典”是一个民族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而确立下来的,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典籍。例如,印度的吠陀文献和佛典、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希伯来和基督教的《圣经》可以说都是元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元典所包含的内在超越精神不断被“重建”、被具体化。用这些思想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经过不断打磨保留下的精华,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历史的冲刷,是人类文明跨出的一大步。

关键词

民本思想; 社会变革; 意识觉醒

1 引言

在元典文化中,《诗经》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本,《周书》在承袭“上天授命”的传统基础上,强调“以德配天”,主张“明德慎罚”等。《易》《诗》等不是儒家的专有,而是诸子百家的共同源头。换句话说,先秦诸子各具特色的学说,都是从对于元典精神不同角度的反思和阐扬中引申出来的,儒家侧重人伦政治,对元典精神做中庸式的积极方向发挥。道家侧重天道

思辨,对元典精神做辩证式的消极方向发挥,墨家发扬元典的经典理性,又兼采谋略和功利主义,阴阳五行家将元典中的神道观念和鬼神观念发展为术数,名家从名实关系反思元典精神。

在这所有的诸子百家中,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君民之辨”,在这个思想发展中,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即由“亲亲”导向“尊尊”,由“孝亲”导向“忠君”,某种程度上来说,说一种“德治主义”的政治论,当元典深论君民关系,其重心也会发生偏移,向左翼发展,便成就了民本主义,向右翼发展,便成就了尊君主义,二者共同融汇为“重民尊君”的政治论体系^[1]。

【基金项目】制度自信融入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KS131)。

【作者简介】张晓明(1981-),男,中国湖南永州人,博士,中级教师,从事哲学研究。

2 民本主义何以形成:德治主义生成基础

中国元典的“君民之辨”是以君为本位的,在殷墟甲骨文辞中,周天子多自称“余——人”,这种“余——

人”“予——人”的自称，正显示了王把自己与其他人对立起来，高高在上，处于绝对尊长的地位，这便是尊君主义的早期表征。《左传》有“君命无二”“臣无二心，天之制也”等尊君论命题，后来的韩非更是把极端的尊君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他说：“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当然“尊君论”远不止《韩非子》那样，在《礼记》中就有“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尊君主义与专制制度密切相关，由此演化出统治人民的艺术就是“顺天应人、禁欲主义等”，从而形成了极端的君主专制政体。

而民本主义思想反其道而行之，民本思潮从源头上可以追溯到作为前元典时代的西周，殷周交替的社会大动荡显示了民众的力量，周初统治者意识到“小人难保”，从而产生了“敬德保民”的新观念。在这里所谓的“德”，指的是统治者的权力和义务，是统治者克配天帝的根据，失德就会失去人民，所以要“保民”即保持对民众的占有，就必须“敬德”，于是周的统治者十分讲究“德政”。对民众的占有方法，是安定民生，进而取信于民。《尚书》还说到一个崭新的命题：“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天意”归结为“民意”，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飞跃，与统治者一味借“天意”行事的横暴态度大相径庭^[2]。

对此孔子说：“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说统治者有德行，人民才会团结中其周围，好像天上的星星环绕在北极星周围。《孟子》阐述君民关系的言论更多，更为有名的是《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于“保民而王”的具体方法，他提出了一系列论述，其要点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轻徭薄税，制民生产；第二，倾听国人意见；第三，与民同乐。孟子认为，还必须从情感上与民众沟通。民本思想一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穷变通久、主张社会革命、强调民众的地位和历史贡献等”，如图1所示。



图1 孟子观点

关于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一直没有中断，反映在很多的著作中，如《北门》《伐檀》《硕鼠》等篇，呼唤出劳苦大众的满腹怨恨，发出对统治者的严厉警告，也成为

制约君主专断独行的有力武器。

3 民本主义思想如何拓展：德治主义的近代转换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尊君论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统治者有意或者无意地强调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当事物发展到极端，其对立面必然会应运而生，其中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天子与民众同贵贱，天子不过是众人中才德超群者，是人民拥戴出来为兴利除害的人，若无才无德，则不配做天子，他的思想中包含有诸多的民本思想，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也为近代民主革命反专制的思想提供了借鉴。

3.1 从“忧患意识”到救亡思潮

民本主义中充斥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作为正式概念的提出比较晚，但忧患意识的形成却较早，如《尚书·周书》的许多篇章都流露出周初人物的忧患意识，忧、患二字连用为一词，始见于战国中期的《孟子》一书：“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忧患意识不是悲天悯人的感情宣泄，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是一种对潜在危机的洞见与预防。

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开篇的魏源，也是近代忧患意识的阐发者，他针对当时流行于行政坛文坛的腐化和黑暗，向人们发出呼唤：“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他受到现实社会危机的刺激，重读《周易》《诗经》等元典，对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有了深刻的认识，由忧患意识发展而来的“救亡图存”思想，这是近代中国有志之士的共通情志。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怀着忧患意识，而投身于改造中国的运动的，有力地冲击了尊君思想。

3.2 从“穷变通久”到社会进化观

中华元典所阐扬的变易哲学以及由变易哲学引申出来的刚健自强、刚柔相济的社会——人生哲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艰难曲折而又辉煌壮丽的历史进程中，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动力，也是历代社会改革家推动社会变革，创新思想家倡导观念转变的依据和武器。

魏源曾将先秦的变易哲学推演为一种历史进化观，由此“变法”观念逐渐成为晚清的一种思潮，而拥有巨大权力的洋务官员推行的维新变法运动，而赋予“变法—自强”主张以实践性，从而给中国近代史打上了相当深刻的印记。

洋务派“变通—自强”的实践，为中国近代化留下了实绩，同时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其中以甲午战争中中方惨败为标志，造成这种双重结局的原因，除国内外形势和洋务派的阶级局限性外，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也与洋务派变易观的矛盾性有关洋务派对文化不同层面持不同的态度，引申出“变”与“不变”的二重观点。张之洞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非术也，非工艺也。”这就是说法制可变而伦常不可变，器械可变而圣道不可变，

工艺可变而心术不可变。洋务派的“变”与“不变”的二重思想，虽然与诸经都有关系，而其渊源则在《周易》中关于“变易”与“不易”的二重学说，后其继续发展就成为“中西西用”的思想^[1]。

继洋务派而起的维新派，其变易观有了新的发展。早期改良派大多出身于洋务大吏的幕僚，他们所持的“变通—自强”观念也依托于元典的精义。王韬在《变法》一文，开篇就引用《周易》的“穷变通久”一义，认为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西方，无不贯穿变易之道。郑观应从《周易》的“易简说”中得到启发，论述变革过程是由简到繁、由繁到简的转化。维新派变易的另一重要发展，在于打破中西壁垒，力求学习西学，并以之作为变通自强的良法。康有为也借用中华元典的固有概念，阐明社会进化观，传播近代民主思想，最终促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却又短命的戊戌变法。

3.3 “从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到近代革命论

近代中国的革命观，有两个源头，一为西方的社会革命思想，一为中华元典的革命论。在西方，“革命”概念历经“中性—贬义—褒义”的转折，而在中国“革命”大体上是一个褒义的，充溢着正气的词汇。

《尚书》特别记述了“汤武革命”的事实，书中记述着对背弃民众的最高统治者予以革除、更替的战斗精神，在中国形成了一种传统，并构成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自19世纪中叶，中国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作过种种努力，除太平天国是以旧式的“革命”方式，企图推翻清朝以外，洋务派和新变法都是以保存清朝的前提下，实行的社会改革。然而，这些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民族危亡日甚一日。在这种情势下，一批觉醒者决心揭起“革命”大旗，奋然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全新的民主共和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者，一方面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另一方面又以中国数千年“革命”传统继承者自命，高呼“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嘹亮口号。当然虽然两者有形式的相同，但是也有性质的区别，古代“革命”不过是改姓换朝，国体政体未变，近代革命则追求一种体制转轨，因此两种革命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承袭性又是显而易见的。

3.4 从原始民主主义、民本思想到近代民主主义

民本思想有着丰富的含义和复杂的演变过程，主要概括为几点：第一，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第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第三，自民众中选贤举能以用之。《论语》篇记孔子的话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第四，安民、重民。

元典所阐发的民本思想虽不是民主思想，但其重民、爱民主张却可以成为对抗残民的君主专制的精神力量，到了近代，它更被传播民主主义的志士仁人所借重，如王韬等人反复论证的与民协商等民主含义，在《周易》《尚书》《周礼》《孟子》等元典书籍中早就存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也都有类似的主张，试图中“民本”与“民主”间建立某种联系，以达到其各自的政治目的。

另外，近代的民主主义又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邓实、黄节等人提出保存国学，恢复民族精神，试图以复兴中国古学来达到振兴民族的目的，还有一些仁人志士，提出“商战”口号，如郑观应等人力求发展工商业，争取利权，与列强的经济侵略相抗衡。

4 结语

综上所述，中华元典中的德治主义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诠释、磨砺、对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掘，有助于激发民族情感，唤起爱国主义热忱的有力方法，近代新学继承并发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在“匡时济世”和“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的支配下以及秉承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民族战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唐长林. 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与时代价值[J]. 人生与伴侣, 2023, (36):34-38.
- [2] 刘梦雅.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及历史作用研究[J]. 西部学刊, 2023(18):136-141.
- [3] 李茂祝. 论《尚书》的治国理政思想[J].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23, (10):108-112.